

社會科學論叢 2012 年 4 月

第六卷第一期 73-116 頁

台灣消費不均度的變化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Taiwan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洪明皇*

Hong, Ming-H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現職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台北市 111 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電話：(02)2861-0511 分機 29837，傳真：(02) 2861-3930，電子信箱：hmh2@faculty.pccu.edu.tw，minghung123@yahoo.com.tw
謝辭：本文歷經多次修改，第一版成果曾在台灣社會福利學會 2009 年年會發表，感謝葉炫偵女士及陳昭榮老師當時的幫忙，也謝謝研討會評論者林金源老師的修改意見。此外，感謝期刊四位匿名審查者的修改建議及主計處與中研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所提供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再者，對於黃成達、曾姿穎與許富盛等三位助理不辭辛勞的文書處理，也由衷感激。

台灣消費不均度的變化

洪明皇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台灣 1980-2007 年家庭收支調查為實證資料，利用吉尼係數分解與計算百分位家戶所得與消費成長率，探討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原因。主要研究發現有兩項：一、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保健與房租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具平均化的作用，且其不均貢獻度愈來愈大。保健支出份額上升，與台灣人口老化及 1995 年實施的全民健保制度有關。二、台灣 1996 年以來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現象並非好事。總消費不均度之所以下降，是因為絕大多數家戶的所得無成長而造成整體消費變異性不大，尤其是低所得家戶的所得無成長但保健與房租支出卻相當高。

關鍵詞：消費不均、吉尼係數分解、經濟福利、台灣

JEL 分類：D12, D31, E21

壹、前言

學術上最常用來測量經濟福利的指標，分別是家戶所得與消費（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a）。已開發國家中，不論學術界或政府機關，是以家戶所得資料為主、消費資料為輔，衡量家戶間的經濟福利差異（Deaton and Zaidi, 2002）；台灣亦是如此。我國自 1964 年有系統地辦理「家庭收支調查」以來，學術界及政府機關進行家戶經濟福利分配研究時，主要實證資料即歷年家庭收支調查的家戶所得資料。

以家戶所得或消費資料測量的經濟福利分配是否有明顯差異？國外有愈來愈多的研究不滿足於以所得為主觀察家戶經濟福利，也以消費為標的做實證研究。例如，有以美國家戶資料為研究對象（Cutler and Katz, 1992; Slesnick, 1994）、以英國為研究對象（Attanasio et al., 2002; Blundell and Preston, 1998）、及以加拿大為研究對象的文獻（Crossley and Pendakur, 2006）。此外，Barreti et al. (2000)、Gouveia and Tavares (1995) 及 Zaidi and Vos (2001) 則分別以澳洲、葡萄牙及歐盟九國為對象，作此議題的探討。上列研究的共同發現是，由消費面與由所得面測量的經濟福利分配有明顯不同，大多數國家的所得不均度總是高於消費不均度；且兩項不均度的變化趨勢未必相同。

台灣的家庭收支調查亦有家戶消費資料，但過去較少看到由消費角度探討經濟福利分配的研究。為何有必要由消費面探討經濟福利呢？本文彙整歐美文獻，整理出以下兩點理由。首先，Cutler and Katz (1992) 認為，就經濟理論來看，恆常所得（Permanent Income）或消費資料比當期所得適合用來衡量家戶間經濟資源的分配。Zaidi and Vos (2001) 更進一步指出，上述論點的主要依據是來自經濟學上的兩個假說。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 發表生命循環假說（Life-Cycle Hypothesis），認為經濟個體消費的多寡，是決定於所得收入及生命長短；即使經濟個體於生命週期中的各時期所得收入有高有低，但仍會儘量使各期消費支出平滑化。此外，Friedman (1957) 的恆常所得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認為經濟個體的消費會隨著恆常所得的上升而增加，若僅是短暫所得的上升對消費的影響相當有限。若綜合 Cutler and Katz 和 Zaidi and Vos 這兩篇文獻的講法，可理解由於已開發國家都不易蒐集或估計家戶恆常所

得數據，所以由消費面測量經濟福利有其優勢。

第二，Barreti et al. (2000) 指出，若家戶有能力藉由借貸或儲蓄使每年的消費平滑化，那麼與每年的家戶所得調查比較，由於一年的家戶所得屬於短暫所得，因此由所得面切入的經濟福利分配研究往往會高估家戶經濟福利不均度。Slesnick (1994) 的研究即指出，多數探討美國二次戰後家戶經濟福利分配的研究，發現美國經濟福利不均度在 1970 年代以來有上升趨勢，乃是採用家戶所得資料。然而若採用家戶消費資料，卻可發現二次戰後至 1990 年代初期經濟福利不均度呈現下降趨勢。Slesnick (1994) 指出若消費資料更適合測量經濟福利分配，那麼社會政策是否有必要過度將焦點置於「上升的所得不均度」，卻不思考「下降的消費不均度」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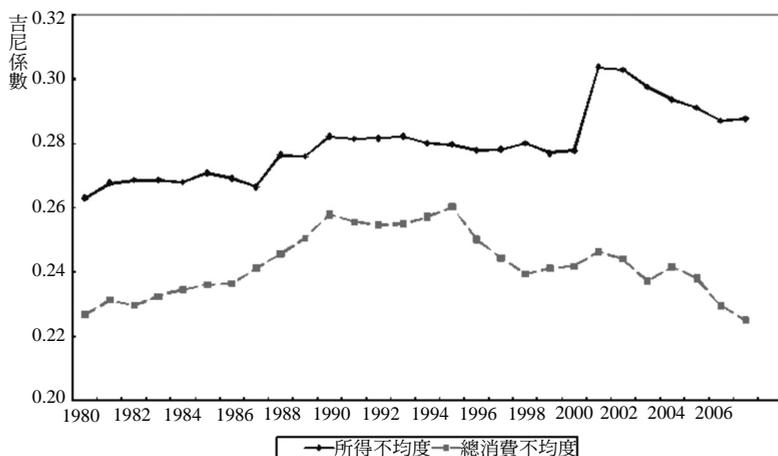
圖 3-1 是以台灣 1980-2007 年家庭收支調查所定義的家戶可支配所得及家戶總消費，所測量的經濟福利不均度。其中，不均度的測量指標是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此係數的功能是在衡量資料的變異程度。² 圖 3-1 透露以下兩項訊息。首先，若將近三十年的資料依 1980 年代、1990 年代及 2000 年以來劃分為三時期，可發現台灣的所得不均度自 1980 年代以來呈階梯狀上升走勢。吉尼係數由 1980 年代的 0.26 與 0.27、微升至 1990 年代的 0.28，接著於 2000 年以後躍升至 0.29 以上。第二，總消費不均度的走勢與所得不均度的變化明顯不同。1980-1990 年間總消費不均度有快速上升的現象，且上升速度大於所得不均度；1991-1995 年總消費不均度變化不大；1996 年以後卻出現下降的走勢。由這兩項觀察來看，台灣 1996 年以後家戶所得不均度與消費不均度出現一升一降的情況，且 2001-2007 年相對於 1996-2000 年而言，兩者的差距明顯再擴大。

綜上所述，可知雖然過去數十年來，已開發國家及台灣多是以家戶所得資料評估經濟福利分配。但自從 1990 年代開始，有愈來愈多研究使用家戶消費資料做此議題的探究，且發現兩種測量標的下的經濟福利分配並不一致。國外於此議題的研究方向，值得台灣研究者省思。必須說明的是，有關台灣所得不均

² 計算家戶可支配所得與總消費時，有經過均等值 (equivalence scale) 處理。本研究在第三節的研究方法中會介紹均等值。

度 1980 年以後擴大的原因，已有不少文獻探討，本文第二節會簡略說明。因此，欲分析 1990 年代中期以來所得不均度與消費不均度差距擴大的原因，焦點變成剖析為何 1990 年代中期以來消費不均度會呈現下降的趨勢。

本研究接下來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二節為文獻整理。第三節說明研究資料與研究方法。第四節分析台灣消費不均度下降的原因。第五節結合所得與消費資料，更深入剖析消費不均度下降的意涵。第六節為結論。



■ 圖 3-1 台灣 1980-2007 年家戶所得不均度與總消費不均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

貳、文獻探討

台灣在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期間曾經歷快速的經濟成長，且物價相對穩定。此期間持續高度經濟成長產生兩項好的結果，一則失業率較低，再則家戶所得分配較平均（鄭文輝，2007）。依照主計處所發佈所得最高 20% 家戶與最低 20% 家的所得差距倍數，這段期間的高、低家戶所得差距倍數大致呈遞減的趨勢，由 1964 年的 5.33 倍下降到 1980 年的 4.17 倍。³關於 1980 年代以前所得

³ 所得最高 20% 家戶與最低 20% 家的所得差距倍數又稱五分位比值，數據是取自主計處（2010）。

分配較平均的原因，Li（2000）、Sun and Gindling（2000）也曾提出解釋，其指出台灣在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受惠於土地改革，避免土地過度集中於富人，加上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及教育普及等因素，才得以維持低度所得不均度。

透過本文圖 3-1 的吉尼係數可以看出台灣 1980 年代所得不均度持續擴大，李瑞中（2009）將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從 1977-2006 年區分為三個十年的區間，對九個十分位數（deciles）做迴歸分析，觀察個別十年內每個十分位數的家戶所得變化。該研究發現第一個十年，所有十分位數的家戶所得都有增加；第二個十年每個十分位數都較前一個十年區間成長快速。但是在第三個十年，第七個十分位數（70th percentile）以下的所得平均都減少；而第七個十分位以上的最高兩個十分位，仍是持續上升的趨勢。就此來看，台灣 1990 年代中期後高所得家戶與中、低所得家戶的所得成長趨勢出現差異，是造所得不均度上升的原因。

有關所得不均度擴大的解釋，主計處（2008a）指出，貿易與金融全球化，以及技術進步促使國際經濟活動益趨緊密，透過勞動市場對不同技術層級勞動力需求的消長，改變勞動報酬結構，進而影響所得分配。于宗先（2008）進一步指出，導致台灣所得分配出現 M 化，亦即，中產階級萎縮而貧富差距擴大的主因有三項；分別是國際間委外生產及供應鏈的建立、國內派遣公司的流行與不合理的賦稅。除了上述解釋外，台灣的少子化與高齡化現象、及婦女就業率提高伴隨而來的離婚率上升等現象促使家戶結構明顯轉變，也都會影響家戶所得分配。上列所提台灣的經濟、社會變遷因素，扮演著使所得不均度擴大的作用。相反地，政府的移轉收支則有助於縮減五分位所得差距。依主計處（2010），政府的社會福利補助使 2007 年五分位所得差距縮減 1.4 倍，而政府對家庭的課稅使五分位所得差距縮減 0.14 倍。社福政策扮演的重分配功能大於稅制，這是因為所得稅、財產稅等制度有過多對富人有利的租稅減免，破壞了稅制的累進性功能。

上列是有關台灣 1960 年代以來所得分配變化及背後原因的扼要回顧。接下來筆者整理的所得分配研究，會與本文的研究方法有關連。朱敬一和鄭保志（2006）在紀念費景漢教授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提及，費教授常使用「因素組

成模型」及「家庭分割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對一個國家所得不均度的貢獻，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 Fei et al. (1978, 1979)。依朱敬一等的整理，所謂因素組成模型是將家庭總所得分為不同類別所得，例如將總所得分為農業所得與非農業所得，或分為薪資所得與非薪資所得，接著再觀察各類所得對所得不均度的貢獻。所謂家庭分割模型是將所有家庭依家庭或戶長特質分為不同類型家戶，例如依戶長年齡、性別等特質將所有家庭切割為組內同質、組間異質的次群體，再觀察分組效果對所得不均度的貢獻。

有關由家戶所得來源別觀察台灣所得不均度變化的研究，曹添旺（1996）及陳孟甫和林弘文（2007）皆使用吉尼係數分解，分別探討 1980-1993 年及 1994-2005 年的所得來源別不均度議題，研究結果頗為一致。不論 1993 年前後，各要素所得不均度占家戶所得不均度的比重，皆以薪資所得最高。此外，各要素所得份額的變化，大致扮演促使吉尼係數下降的角色，然此改善家戶所得不均度的效果不夠大，無法抵消各要素所得本身不均度的擴大，導致家戶所得不均度呈現上升趨勢。

本研究主要就是利用因素組成模型法，來分析台灣消費不均度下降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議題與 Garner (1993) 的研究很接近。Garner (1993) 以美國 1987 年的家戶消費調查為實證資料，使用吉尼係數分解法探討該年度各項消費對總消費不均度的貢獻。該研究發現，食品支出、住宅支出、交通支出等三項對總消費不均度的貢獻最大，貢獻度合計達達 54%。再者，家事管理支出、衣著服務支出、娛樂支出等三個項目的邊際效果 (relative marginal effect) 為正，這意謂家戶總消費或總所得較高的家戶，花了相當多的支出在這三個項目上。Garner (1993) 認為邊際效果這項指標可以作為課稅政策的判斷準則，若某消費項目的邊際效果為正，則對該項目課貨物稅會降低整體消費不均度；此時課稅效果是累進性的，因為課貨物稅對有錢人的影響較大。反之，若邊際效果是負的，則對該項目課稅會使消費不均度上升，此時課稅的效果是累退的。

本研究與 Garner (1993) 不同的地方是，筆者除了用吉尼係數分解法探討台灣消費不均度下降的原因外，還會進一步嘗試說明「消費不均度下降是不是好事」？就所得面而言，一國政府或人民總希望所得不均度要低。但消費不均度低是好事嗎？Johnson and Shipp (1995) 發現美國 1992-93 年相對於 1989-90

年的消費不均度下降，即指出一國的消費不均度下降未必是社會期待的好事。因為，這可能是全體家戶的經濟狀況普遍變差，而造成整體消費停滯以致於家戶消費金額變異性不大的現象。本研究會應用 Brewer et al. (2006) 的分析方法，嘗試判斷台灣 1990 年代中期以來消費不均度下降到底好不好，有關 Brewer (2006) 等的研究方法，將在第三節一併說明。

最後，關於研究資料的侷限及所得不均度與消費不均度的關係，須再作說明。首先，本文的探討中會推敲所得分配與消費分配的演變關係，但由於本研究使用的是橫斷性資料庫，所以無法精確釐清所得分配如何影響消費分配。若想更有把握地說明所得分配怎麼影響消費分配，必須使用追蹤調查資料；Blundell et al. (2008) 和 Casado (2011) 就是使用追蹤調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再者，依 Blundell et al. (2008) 和 Casado (2011) 所述，所得分配變化如何影響消費分配，取決於「所得變動的持續期間」及「家戶平滑化消費的能力強弱」。前者可分為恆常所得變動及短暫所得變動；後者指的是當家戶所得受到負面衝擊時，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使消費不致遭受太大的負面影響，可稱其為 Smoothing Mechanisms 或 Insurance Mechanisms。

目前學術上主要有兩項假說，被用來說明家戶消費如何受所得變動影響，分別是第一節曾提及的恆常所得假說，及完全市場假說 (Complete Market Hypothesis)。前項假說認為：若家戶僅短暫所得受衝擊，則其可透過儲蓄與借貸來平滑化消費，若是恆常所得受衝擊，則消費也會受衝擊。後項假說認為，在完全市場的前提假設下，家戶不論面對短暫所得或恆常所得衝擊，都可以平滑化消費。筆者會基於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在最後一節搭配經濟假說作一些討論。

參、研究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資料與研究期間

家庭收支調查是橫斷面（Cross-Section）的公務統計，製作之主要目的是提供官方國民所得統計所需的數據，近四十年來已成為官方與學界觀察所得分配的主要資料。主計處（2010）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書提及，我國從 1964 年開始有系統的辦理家庭收支調查，在 1964-1970 年間是每兩年辦一次，1972 年開始則每年調查一次。1976 年以後的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Raw Data）都可向主計處申請做學術研究。正由於該資料記載家戶內各項收入與支出，可供研究者同時探討家戶所得與消費的變化，是最適合本研究主題的資料庫。

本文的研究期間是 1980-2007 年。只分析到 2007 年的原因有兩項：首先，雖然 2008-2010 年的原始檔已開放申請，但 2009 年起的家庭收支調查消費科目已改依聯合國 2000 年版「用途別個人消費分類」（Classification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Purpose, COICOP）分類方式重新分類，與 2008 年以前的科目分類方式不同。⁴ 第二，即使 2008 年的消費分類與 1980-2007 年是一致的，但考量 2008 年受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家庭作消費決策可能有較特別的應對而反映在消費數據上，筆者關心的焦點並非金融海嘯對家戶消費的影響。家庭收支調查的抽出樣本數占母體家戶的比率，在 1980-83 年間是採 4% 的固定抽出率；1984-2007 年則將樣本數固定在 13,000-16,500 個家戶，由於此期間台灣母體家戶數不斷增加，因此 2007 年的抽出率已減為 1.8% 左右。

此調查的內容包含家戶的收入與支出數據，及家戶成員的社會經濟特徵。收入面的數據有家戶層次的各類所得，也有精細至家戶內各成員的各項所得；再者支出資料的統計是以家戶為單位，因為統計實務上較難將支出切割去界定某數額是某人所支用。家庭收支調查的家戶總所得組成有六類，包含薪資所得、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收入、經常移轉收入及雜項收入。此調查所定義的家戶經常性支出包含「非消費支出」與「消費支

⁴ 讀者可透過對照 2009 年及以前年度的家庭收支調查「調查表格式」，以瞭解改制前後的消費科目分類差異。

出」。其中，非消費支出包含利息支出與經常移轉支出兩大類，而消費支出即本研究探討家戶消費分配所採用的家戶消費代理變數。家戶消費支出有十二類組成，包含食品費、飲料費、菸草費、衣著費、房地租及水費、燃料及燈光、家具及家庭設備、家事管理費、保健及醫療費、運輸交通與通訊費、娛樂消遣及教育文化費，以及什項支出。本研究以下所稱家戶總消費即指這十二項消費項目的加總。另外，本研究以下所稱的家戶所得是指可支配所得，其計算方法是家戶總所得減非消費支出。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需介紹的有三個，分別是均等值（Equivalence Scale）、吉尼係數分解、百分位所得與消費成長率之計算方法；說明如下。

1. 均等值

進行家戶經濟福利分配研究時，由於涉及不同「戶量」及「組成」家戶的所得與消費高低比較；因此，必需將不同家戶的所得與消費調整至可比較的狀態。均等值就是用來使不同類型家戶得以做經濟福利高低比較的調整因子。Buhmann et al. (1988) 指出，不同的均等值測量因各自敏感度有別，亦使得測量結果會相異，是以並無所謂最佳的均等值。

洪明皇和鄭文輝（2009）指出均等值主要有三種型式，依是否考慮戶內人口年齡組成及規模經濟因子而有所差別。第一類是僅考慮戶量及消費規模經濟因子。其函數形式為 $(E = N^F)$ ，其中 E 為均等值， N 為戶量， F 為消費規模經濟因子。第二類是同時考慮戶量、年齡組成及消費規模經濟因子。這類均等值只考慮成人與小孩的消費差異，並不對家戶內的成人再作區分。其函數形式為 $(E = (1 \times N_a + P_c \times N_c)^F)$ ，其中， N_a 及 N_c 分別為戶內成人數及戶內小孩數， P_c 為小孩相對於成人之消費需求比例。第三類是除考慮戶量、年齡組成及消費規模經濟因子外，並將戶內成人區分為戶長及戶長以外的成人。函數形式為 $(E = (1 + P_a \times N_a + P_c \times N_c)^F)$ ，其中， N_a 及 N_c 分別為戶長以外的戶內成人數及戶內小孩數， P_a 為戶長以外之成年人相對於戶長之消費需求比， P_c 為小孩相對於戶長之消費需求比。

有關上列函數的參數值， F 值介於 0 到 1 之間，設為 0 表示家庭內財貨全是公共財，設為 1 表示財貨全是私有財，國外文獻曾歸納 F 值設於 0.65 到 0.75 間較恰當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b)。國內王永慈 (1995) 進行所得分配研究時， F 值就設在 0.72。涉及跨國所得分配比較的研究，最常用第一種均等值型式，並且 F 值設為 0.5。至於小孩相對於成人的消費需求，國內這個主題的實證研究並不多，依王德睦等 (2003) 的研究顯示，18 歲以下小孩的生活成本是成人的 0.68-0.71 倍。

本研究考量台灣三十年來人口結構有明顯變遷，因此選用有區別小孩與成人的生活成本而可以反映人口結構、型式又不會太複雜的第二類的均等值型式。此外，參酌前列有討論均等值函數值的文獻後，將 P_e 設為 0.7； F 也設為 0.7。接著，將所有家戶的可支配所得與消費除以均等值，便得到調整後可支配所得與調整後消費；再以此兩項調整後數值做家戶間經濟福利的高低排序。

2. 吉尼係數分解

欲探討不同所得對家戶總所得不均度的貢獻，必需做所得別的不均度分解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c)。同理，要分析特定家戶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的貢獻，則需做消費項目別的不均度分解。台灣過往的經濟福利研究中，曾看到以家戶所得別吉尼係數分解，探討不同所得對家戶所得不均度影響的研究；如曹添旺 (1996) 及陳孟甫和林弘文 (2007)。但未曾見到探討特定家戶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影響的文獻。本研究將以吉尼係數分解探討不同消費項目對我國家戶消費不均度的影響。以下關於吉尼係數分解的說明，是整理自 Lerman and Yitzhaki (1985)、Lopez-Feldman (2006)；筆者將套用這兩篇文獻關於所得別吉尼係數分解的介紹，來說明本研究的消費別吉尼係數分解。

吉尼係數分解公式為 $G = \sum_{k=1}^k S_k G_k R_k$ ，其中， G 為總吉尼係數， k 是不同消費項目的代號。 S_k 是第 k 項消費占總消費的份額； G_k 是第 k 項消費的吉尼係數； R_k 是第 k 項消費與家戶總消費之吉尼相關係數，為各項消費與家戶總消費之排序的共變異係數除以其自身排序的共變異係數，以數學式表示即 $\text{Cov}(y_k, F(y)) / \text{Cov}(y_k, F(y_k))$ 。其中， y 是家戶總消費的數值，而 y_k 是特定消費項目的值。

就消費份額而言，若某消費項目占總消費的比重很高，則該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影響會較大。就個別消費項目的分配而言，若某消費項目分配相當平均，則該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影響會很小。反之，若某消費項目占總消費份額很大且此消費項目的分配相當不平均，則此消費項目究竟會大幅增加或減少總消費不均度，端視此消費項目與總消費的吉尼相關係數而定；其中，吉尼相關係數介於 -1 與 1 之間。若某消費項目分配相當不平均且高消費者持有份額較多，則該消費項目會增加總消費不均度；反之，若某消費項目分配相當不平均但低消費者持有份額較多，則該消費項目會減少總消費不均度。

本研究作吉尼係數分解時，將家戶總消費分為六個項目之加總，分別是食品支出、保健支出、房租及水費支出（以下簡稱房租支出）、運輸交通與通訊支出、娛樂消遣與教育文化支出（以下簡稱娛樂與教育支出）、其它消費支出。其中，其它消費支出就是前五個項目以外的消費之加總。筆者如此區分主要是考量 2007 年上列五項消費項目已是台灣全體家庭平均消費組成占率的前五大，依筆者的計算 2007 年這五個項目的占率由高到低分別是食品支出 23.5%、房租支出 22.2%、保健支出 14.8%、運輸與通訊支出 11.4%、娛樂與教育支出 10.6%。⁵ 本研究是以 Stata 統計軟體的關鍵指令 `descogini`，進行消費項目別的吉尼係數分解。

3. 百分位所得與消費成長率之計算方法

Brewer et al. (2006) 在說明英國所得不均度與消費不均度的變動原因時，曾利用簡單易理解但文獻上較少看到的方法來分析，即透過對照「平均每年所得百分位的所得成長線」與「平均每年消費百分位的消費成長線」的差異，來說明所得與消費不均度的變化原因。⁶ 具體來說，該研究為了釐清英國 1980 年代所得不均度與消費不均度上升的原因，就先計算 1979-1990 年家戶所得由低到高百分位下的各分位所得金額；接著計算後一年度每分位所得金額相對於前一年度每分位所得金額的成長率，例如 1980 年相對於 1979 年每分位的所得成長率、1981 年相對於 1980 年每分位的所得成長率；最後再計算平均每年所得

⁵ 筆者將台灣 1980 年、1996 年、2007 年的家戶消費組成數據置於附表 1，俾有助於讀者瞭解台灣的家戶消費組成變化。

⁶ 詳見 Brewer et al. (2006)，第 7-8 頁。

百分位的所得成長線。同樣地，消費線的處理步驟亦可類推，不同的是計算標的變成家戶消費由低到高百分位下的各分位消費金額。

當兩條線放在同一張圖時，橫軸為所得百分位或消費百分位，縱軸為平均成長率，由於 Brewer et al. 發現兩條線都是由左下往右上方漸增，且所得線比消費線陡；所以據此推論 1. 因為所得較高百分位家戶的平均每年所得成長率比低所得分位高，所以英國 1980 年代所得不均度是上升趨勢。消費較高百分位家戶的平均每年消費成長率比低消費分位高，所以同時期消費不均度是上升趨勢。2. 因為所得線比消費線陡，所以這段期間所得不均度大於消費不均度。Brewer et al. 的分析方法，有點類似本文第二節所提李瑞中（2009）的分析方法，不同的地方在於李瑞中僅觀察所得、且僅將全體家戶劃為十等分位；而 Brewer et al. 同時觀察所得與消費，且將家戶劃為百分位。⁷

肆、不同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影響

一、吉尼係數分解

吉尼係數的分解公式為 $G = \sum_{k=1}^k S_k G_k R_k$ ，其中， k 是不同消費項目。 S_k 是特定消費項目的份額； G_k 是特定消費項目的吉尼係數； R_k 是特定消費項目的吉尼相關係數。這三項分解數據置於表 3-1 的第二、三、四欄。第五欄是特定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的貢獻，是利用前三欄數據所求算，數學式為 $I_k = \frac{S_k G_k R_k}{G_n}$ ，各類消費項目不均貢獻度總和為 1。再者，第六欄代表各項消費對總消費不均度的邊際影響（relative marginal effect），數學式為 $(I_k - S_k)$ ，代表若所有家戶的某類消費支出皆增加 1% 時，總消費不均度的變動方向。+ 號表示邊際變動會使總消費不均度上升，- 號表示邊際變動會使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第七欄是各消費項目的彈性，數學式為 $(R_k * G_k) / G$ 。若彈性為正值，表示該消費項目為正常財（normal goods）。在吉尼相關係數不變下，消費項目的吉尼係數愈大，則彈性

⁷ 但讀者須留意李瑞中（2009）是用分量迴歸的方法進行分析，而 Brewer et al.（2006）則僅觀察統計量變化。

愈大；若零消費是集中在總消費較低的家戶，則該消費項目的彈性較大。

本研究將家戶總消費分為食品支出、保健支出、房租支出、運輸與通訊支出、娛樂與教育文化、與其它消費等六項，再對 1980 年與 2007 年的家戶消費資料進行吉尼係數分解。以下先觀察表 3-1 第五欄各消費項目的不均貢獻度；再分析各消費項目的份額、吉尼係數、吉尼相關係數；最後再看各消費項目的邊際效果及彈性。

1980 年食品支出、保健支出、房租支出、運輸與通訊支出、娛樂與教育支出、其它消費對總消費不均度的貢獻分別為 0.261、0.039、0.208、0.091、0.131 與 0.268。若不考慮其它消費，則該年度對總消費不均度貢獻最大的是食品支出，其次是房租支出，第三是娛樂與教育支出；這三類支出的兩兩貢獻度差距約在 6 個百分點。至 2007 年，六類消費的不均貢獻度分別是，食品支出 0.180、保健支出 0.123、房租支出 0.158、運輸與通訊支出 0.157、娛樂與教育支出 0.188、其它消費 0.192。其中，食品支出、房租支出及其它消費對總不均度的貢獻度都有明顯的減少，這三個項目貢獻度各有 5-8 個百分點的下降。反之，保健支出的貢獻度上升了 8 個百分點，運輸與通訊支出的貢獻度上升 6 個百分點，娛樂與教育支出的貢獻度上升 5 個百分點。

由不均貢獻的數學公式可知，貢獻度的變化與各消費項目占總消費的份額、各項日本身的不均度與吉尼相關係數等三項因子的大小有關。就消費份額來看，保健支出不均貢獻度之所以有三倍的成長，由 1980 年的 0.039 成長到 2007 年的 0.123，這與保健支出份額在這近三十年間大幅增加有關。1980 年的保健支出份額僅 0.042，而 2007 年的份額已達 0.144。保健支出的份額提升，筆者認為可能原因有兩個。第一，與台灣人口結構變化有關，尤其是人口老化現象。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09），台灣於 1994 年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已占全體人口的 7%，2007 年老人占率上升到 10.2%；老人人口多則保健支出隨之增加。王金利和于宗先（2009）探討高齡化對國民消費結構的影響時，也指出老人退休後與上班有關的消費支出會減少，而健康因素會使醫療支出增加，若得慢性病而需長期照護，花費更是可觀。

第二項原因，可能是台灣 1995 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的制度效果。筆者推測，全民健保制度應有促使 1990 年代中期以來家戶保健支出份額提升的效果；

一方面是部分負擔制度可能誘發醫療需求者多看病，另一方面因為全民健康保險的支付制度，基本上是依醫療提供者的服務量來計酬，在此支付制度下難免有供給誘發需求的行為，而致使家庭保健支出上升。並且，人口老化、健保實施、加上商業行銷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台灣的醫療保健產業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亦蓬勃發展，這也是造成保健支出上升的原因。

運輸與通訊支出、娛樂與教育支出的份額在同一期間的成長，也是促使這兩個項目對整體消費不均貢獻度上升的原因。運輸與通訊支出份額在這段期間由 0.066 上升到 0.124，娛樂與教育支出份額則是從 0.081 增加到 0.124。有關運輸與通訊支出份額的增加，可參照彭素玲等（2009）的數據。該研究把家庭收支調查的運輸與通訊支出，再拆出「個人交通設備使用管理及保養費」、「其他通訊費」等兩個細項，並觀察 1995 年與 2005 年的數據變化。該研究顯示，個人交通設備使用管理及保養費由 1995 年的平均每戶 25,212 元，成長到 2005 年的 39,804 元。其他通訊費則由 1995 年的 5,887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1,857 元；成長近四倍，筆者推測這與台灣電腦網路及手機等通訊產品的大量使用有關。娛樂與教育支出份額增加，則與 2001 年實施週休二日有關。

再看消費項目別的吉尼係數，若不考慮其他消費，則不論 1980 年或 2007 年，食品支出與房租支出的吉尼係數都是最小，亦即這兩個項目在家戶間的分配較其它三個消費項目平均。其原因在於飲食與住宅是最基本的生活開支，每個家庭都會有這兩項支出；尤其是飲食，不論所得高、低家庭都會有此支出，且再怎麼能吃、吃得再好，與其它項目比較其變異相對較小。所以 1980 年食品支出的吉尼係數是 0.223，而 2007 年是 0.284，都是吉尼係數最小的項目。

吉尼相關係數方面，最須注意的是保健支出。以 2007 為例，保健支出的吉尼相關係數是 0.594，而其它五個項目都在 0.7 以上。本文第三節介紹吉尼相關係數時曾提及，若某消費項目分配相當不平均且低消費者持有份額較多，則該消費項目會減少總消費不均度。此處指的是相對於其它消費項目而言，該項目的吉尼相關係數會較低。彭素玲等（2009）曾將台灣 1995-2005 年全體家戶依家戶所得高低分五等分位，並觀察這段期間的平均家戶消費組成。該研究顯示最低所得組配置在保健支出的消費比率恆大於最高所得組。以 2005 年為例，最低所得組的消費有 18.78% 配置在保健支出，最高所得組則為 11.22%。就此來

看，保健支出的吉尼相關係數之所以低於其它消費項目，應該是保健支出分配不平均且總消費較低的家戶持有的份額較多所致。第五節前半部會對此再作分析。

就邊際影響的方向來看，食品支出與保健支出在 1980 年與 2007 年都是負號，代表這兩個項目的邊際變動會使總消費不均度下降。以 2007 年的食品支出為例，當所有家戶的食品支出增加 1% 時，總消費不均度會下降 0.042%。反之，運輸與通訊支出、娛樂與教育支出在兩個年度的邊際變動都是正值，代表所有家戶的運輸與通訊支出或娛樂與教育支出增加 1% 時，會使總消費不均度上升。房租支出的邊際變動方向較特別，1980 年是 0.019%，而 2007 年是 -0.047%；代表房租支出的邊際變動在前一個時期會增加總消費不均度，後一個時期則有降低總消費不均度的作用。此處僅看分解數據，對於理解房租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影響，可能還無法很直觀，因此本節的第二部分會再作圖形分析。

如果對照邊際變動與彈性的數值，可發現邊際變動為正值且其值愈大者，則彈性值也愈大。由表 3-1 可看出，1980 年娛樂與教育支出及運輸與通訊支出的彈性最大，分別是 1.606 及 1.375；2007 年這兩個消費項目的彈性值也是最大。

■ 表 3-1 台灣 1980 年與 2007 年消費項目別的吉尼係數分解

	消費項目	消費份額 (S_k)	吉尼係數 (G_k)	吉尼相關係數 (R_k)	對整體不均度的貢獻 (I_k)	邊際影響 ($I_k - S_k$)	彈性 ($R_k * G_k$)/ G
1980	食品支出	0.363	0.223	0.804	0.261	-0.102	0.752
	保健支出	0.042	0.498	0.471	0.039	-0.002	0.942
	房租支出	0.188	0.371	0.742	0.208	0.019	1.105
	運輸與通訊支出	0.066	0.473	0.724	0.091	0.024	1.375
	娛樂與教育文化	0.081	0.537	0.745	0.131	0.049	1.606
	其它消費	0.257	0.300	0.866	0.268	0.010	1.043
	總消費	1.000	0.249	-	1.000		
2007	食品支出	0.223	0.284	0.819	0.180	-0.042	0.807
	保健支出	0.144	0.414	0.594	0.123	-0.021	0.853
	房租支出	0.206	0.313	0.706	0.158	-0.047	0.767
	運輸與通訊支出	0.124	0.448	0.809	0.157	0.032	1.258
	娛樂與教育文化	0.124	0.542	0.800	0.188	0.063	1.505
	其它消費	0.176	0.370	0.850	0.192	0.016	1.092
	總消費	1.000	0.288	-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影響的圖形分析

吉尼係數分解雖然是解釋性的分析方法，但只呈現 1980 年與 2007 年兩個時點的數據，對於理解 1980-2007 年間不同消費項目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影響仍有不足，底下再以折線圖為輔助。圖 3-2 是台灣 1980-2007 年的總消費不均度、不含食品支出的消費不均度及不含保健支出的消費不均度。圖 3-3 則是總消費不均度與不含房租支出的消費不均度。本研究透過這兩張圖，觀察有無包含食品支出、有無包含保健支出、有無包含房租支出的消費不均度差異。因為不含房租的消費不均度有部分年度低於總消費不均度，但部分年度又高於總消費不均度，所以分兩張圖觀察，這是基於視覺上的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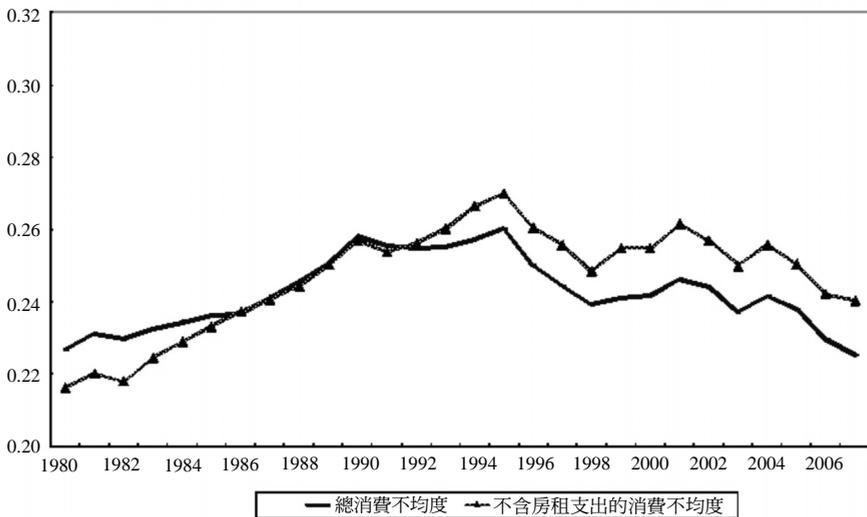
透過圖 3-2 可發現，不含食品支出與不含保健支出的不均線，皆高於總消費不均線，可見食品支出與保健支出都具有平均化（Equalize）家戶總消費不均度的功能。但是，若將不含食品支出與不含保健支出的消費不均線分別與總消費不均線比較，可發現 1980 年以來不含食品支出的不均線與總消費不均線的垂直距離由大變小，表示食品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平均化功能逐時變小。反之，不含保健支出的不均線與總消費不均線的垂直距離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變大，代表保健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平均化功能愈來愈大。表 3-1 食品支出的邊際影響為負號，但由 1980 年的 0.102 縮小為 2007 年的 0.042，而保健支出亦為負號，但在同一期間由 0.002 增大為 0.021；這當中的數據變化與圖 3-2 的折線變化相當契合。

再看圖 3-3 有無計入房租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影響，1980 年以來不含房租支出的不均線與總消費不均線的相對位置有較特別的變化。1980-85 年不含房租的不均線都在總消費不均線的下方，且兩條線的垂直距離逐漸縮小。1986-92 年兩條線幾乎是重疊。1993 年以後不含房租的不均線都在總消費不均線的上方，且垂直距離逐漸擴大。這樣的變化趨勢表示，房租支出在 1980 年代初期有使總消費不均度增大的作用，而在 1993 年以後反而是使總消費不均度縮小。房租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影響之所以如此變化，與經濟弱勢家庭的房租負擔不斷提高有關，在下一節會更深入剖析。



■ 圖 3-2 台灣 1980 年至 2007 年總消費不均度、不含食品支出的不均度、不含保健支出的不均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



■ 圖 3-3 台灣 1980 年至 2007 年總消費不均度與不含房租支出的不均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

伍、消費不均度下降是好事嗎？結合所得與消費資料的分析

第四節的分析僅使用消費資料，若欲回答消費不均度下降好不好這個問題，有必要再引入所得資料，才有助於作較客觀的判斷。本節將進行兩項結合所得與消費資料的分析。首先，不同所得階層家戶的消費行為會有差異，由第四節可瞭解「保健支出」與「房租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的平抑力量愈來愈大，若能再分析不同所得階層的保健支出與房租支出差異，更能釐清此現象的原因，也較能從中汲取政策意涵。

第二，本文第二節曾提及 Johnson and Shipp (1995) 發現美國 1992-93 年相對於 1989-90 年的消費不均度下降，即指出一國的消費不均度下降未必是社會期待的好事。因為，這可能是全體家戶的經濟狀況變差而造成整體消費停滯以致於家戶消費金額變異性不大的現象。由第四節的吉尼係數分解，我們僅能看出食品支出及保健支出都有使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作用，而且保健支出對總消費不均貢獻度持續增大，這是使台灣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但筆者想進一步檢視台灣的消費不均度下降，是否可以套用 Johnson and Shipp (1995) 的說法。我們將透過比較百分位所得與消費成長率差異，來思考消費不均度下降是不是好事，這個觀察方式是參考 Brewer et al. (2006)。

一、高低所得組的保健支出與房租支出差異

表 3-2 是 1980 年、1996 年及 2007 年均等化所得最高與最低 10% 家戶的消費組成（以下稱高所得組、低所得組）。由於 1980 年的保健支出細項與 1996 年、2007 年的細項不完全一致，所以僅呈現後兩個年度的保健支出細項。此表也列出各所得組的各年齡層人口數，包括 0-17 歲小孩數、18-64 歲壯年人數、65 歲以上老人數。

先看高低所得組的人口結構變化，會有助於理解其消費組成變化。1980 年低所得組的平均戶量是 5 人，其中有 0.3 個老人；高所得組平均戶量是 3.7 人，其中有 0.1 個老人。到了 2007 年，低所得組有明顯小戶量化及老化的趨勢，平均戶量減為 2.4 人且其中老人多達 0.8 人；高所得組平均戶量是 3 人，反而比低

所得組多，而老人僅 0.2 人。正因為我國低所得家庭戶量減少且老化，所以低所得組食品支出比率由 1980 年的 47.5% 降為 1996 年的 29.6%，相對地同時期保健支出由 5.5% 增加到 16.7%。在 1996 年，高所得組的保健支出占率僅 6.9%，與低所得組的 16.7% 有明顯差距。由此可知，保健支出之所以在 1996 年平抑總消費不均度的作用變大，是因為高低所得組的保健支出占率有明顯差異。

必須先說明的是，所得低的家庭，未必也是消費低的家庭；所得高的家庭，也不全然是消費高的家庭。反之消費高的家庭，也不全然是所得高的家庭。但是，由 McGregor and Borrooah (1992) 及洪明皇等 (2009)⁸ 可瞭解所得低的家庭，大部分也是消費低的家庭；所得高的家庭，大部分也是消費高的家庭。反之亦然。有了這樣的認知前提後，應該就能理解即使此處是在所得階層分組下觀察消費組成，但以觀察到的結果來推論保健支出對消費不均的影響，也不無道理。而這個認知前提在本節第二部分的百分位分析，亦是推論的重要基礎。

第四節所提到的「人口老化」與「健保制度誘因」兩因素，對家戶保健支出成長有貢獻的詮釋，在表 3-2 的低所得組數據更能獲得映證。1. 1996 年低所得組的老人數已達 0.6 人，人口老化會使家戶保健支出增加。2. 深究保健支出的細項，1996 年低所得組有 71% 是用在健保就診費，反之高所得組只有 48%，由此可看出低所得組因「老化+健保制度誘因」而有相當額度的保健支出。此處所指的制度誘因，包含部分負擔制度與論量計酬的支付制度。依筆者從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所擷取的數據，1996 年低所得組的「健保就診費」有 34,808 元，甚至高於同年高所得組的 31,283 元。

透過表 3-2 的低所得組房租支出變化，將可理解為何圖 3-3 會看到房租支出平抑總消費不均度的現象。1980 年低所得組的房租支出占率是 13.2%，高所得組是 22.4%。至 1996 年，低所得組的房租支出竟躍升為 23.6%、2007 年又增到 24.9；就占率而言，與高所得組已不相上下、甚至更高。台灣的住宅價格指數在 80 年代後期到 90 年代中期經歷大幅度上漲（陳建良，2007），這導致經

⁸ McGregor and Borrooah (1992) 曾將英國 1985 年的家戶所得由低至高分十等分位，且也將家戶消費由低至高分十等分位，並作十分位交叉表。洪明皇等 (2009) 也曾用台灣 2007 年的家戶所得與消費資料作十分位交叉表。兩項研究如此操作的目的，是觀察所得十分位與消費十分位重疊的比率。

濟弱勢的居住成本變高，我們因而觀察到圖 3-3 的「不含房租支出的消費不均線」在 1993 年以後高於「總消費不均線」。

■ 表 3-2 所得最高與最低 10% 家戶的消費組成

		1980	1996	2007
最低 10% 家戶	戶內人口 年齡組成	孩 2.4 人 壯 2.3 人 老 0.3 人	孩 1.0 人 壯 1.6 人 老 0.6 人	孩 0.4 人 壯 1.2 人 老 0.8 人
	食品支出	47.5	29.6	28.2
	保健支出	5.5	16.7	17.1
	醫療用具設備 (811)	—	(1.2)	(1.0)
	住院診療及非受僱醫院醫護服務 (812)	—	(15.3)	(17.1)
	醫療用品支出 (813)	—	(10.1)	(10.7)
	人身意外災害醫療保險 (814)	—	(1.5)	(4.3)
	健保就診費 (816)	—	(71.6)	(66.7)
	房租支出	13.2	23.6	24.9
	運輸與通訊支出	4.6	6.2	8.1
	娛樂與教育文化	4.4	6.5	5.7
	其它消費	24.8	17.2	16.1
	合計	100	100	100
	最高 10% 家戶	戶內人口 年齡組成	孩 1.0 人 壯 2.6 人 老 0.1 人	孩 0.8 人 壯 2.4 人 老 0.2 人
食品支出		27.4	19.4	18.4
保健支出		3.4	6.9	12.0
醫療用具設備 (811)		—	(6.7)	(4.4)
住院診療及非受僱醫院醫護服務 (812)		—	(17.9)	(17.9)
醫療用品支出 (813)		—	(13.2)	(12.4)
人身意外災害醫療保險 (814)		—	(13.4)	(26.1)
健保就診費 (816)		—	(48.6)	(38.9)
房租支出		22.4	23.8	21.5
運輸與通訊支出		8.1	10.9	13.2
娛樂與教育文化		9.9	15.5	14.5
其它消費		28.9	23.6	20.4
合計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百分位所得與消費成長率對照

由於 1996 年是總消費不均度開始下降的轉折年度，所以將觀察期間分為 1980-1995 年及 1996-2007 年兩段時期。這項時間點的劃分也切合台灣的社會經濟變化，因為主計處（2008b）顯示，台灣 1990-1995 年的失業率都在 1.63% 以下，但 1996-2000 年的失業率都高於 2.35%，而 2001-2007 年的失業率更大於 3.84%。全體家戶失業率增加，會影響家戶的所得收入，也會進而影響家戶的消費。

接著，將每一年度的全體家戶分別依所得高低及消費高低，分為所得百分位（percentile）及消費百分位，並計算每個百分位的均等所得及均等消費。家庭收支調查每年的樣本家戶約 13,000 餘戶，所以切割為百分位後，每一分位約有 130 餘戶，因此所謂每一分位的均等所得，就是每 130 餘戶之平均均等所得；消費可類推。但需說明的是，本研究計算的統計值都有考慮權數（weight），所以呈現的都是母體的統計值。最後，計算 1980-1995 年間所得百分位家戶的平均均等所得成長率及消費百分位家戶的平均均等消費成長率，如圖 3-4。1996-2007 年的平均成長率計算方式亦是如此，如圖 3-5。

所謂平均每年均等所得成長率，以圖 3-4 的 1980-1995 年為例，就是分別計算 1981 年相對於 1980 年各百分位的均等所得成長率、1982 年相對於 1981 年各百分位的均等所得成長率、……及 1995 年相對於 1994 年的各百分位均等所得成長率，最後再加總各等分位的成長率並除以 15（期數）；消費成長率的計算方式可類推。圖 3-5 的 1996-2007 年平均每年均等所得與消費成長率計算方式亦如同圖 3-4 的計算方式，但是僅除以 12。上列所得與消費的計算都經過物價指數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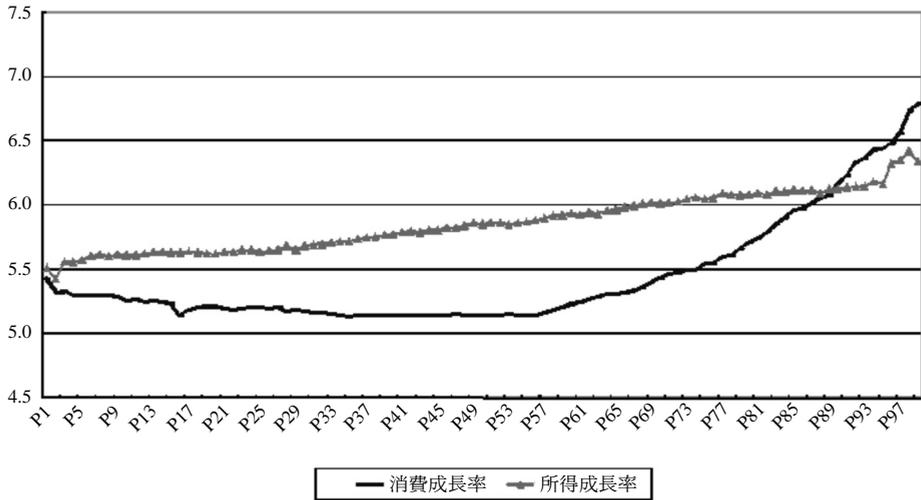
圖 3-4 與圖 3-5 雖然把各時期的所得線與消費線劃在同一張圖，但所得線是依所得百分位繪製，消費線是依消費百分位繪製。誠如本節第一部分所述，所得低的家庭，未必也是消費低的家庭；所得高的家庭，也不全然是消費高的家庭。反之消費高的家庭，也不全然是所得高的家庭。但是，所得低的家庭大部分也是消費低的家庭；所得高的家庭大部分也是消費高的家庭。

本文第一節的背景圖顯示，台灣 1980-1995 年所得不均度與消費不均度都

呈現上升的趨勢。雖然消費不均度總是小於所得不均度，但就目測法來看，在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間，消費不均度上升速度並不亞於所得不均度，這可由這段期間消費線比所得線陡而看出。有關台灣 1980 年以後所得不均度上升的原因，本文第二節曾引相關文獻作詮釋，圖 3-4 可視為從另一角度分析這段期間所得不均度為何會上升。這段期間的百分位平均每年均等所得成長率，呈現由低分位往高分位漸增的趨勢，第一分位的成長率是 5.5%，第 68 及更高分位的成長率都在 6% 以上，因此不難理解這段期間的所得不均度會有上升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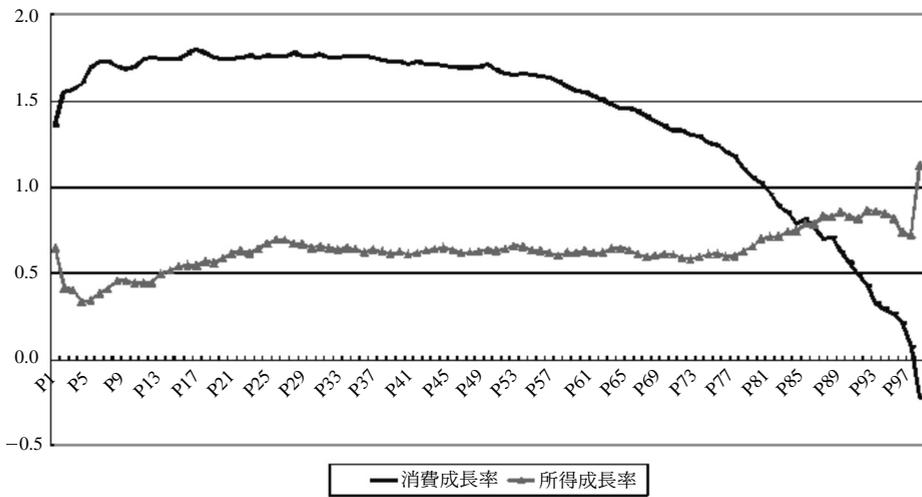
就圖 3-4 的消費線來看，第 37 分位以前大致是負斜率 (slope) 走向，即第 37 分位以前低消費分位的成長率大於高消費分位的成長率；37-57 消費分位的成長率大致相同；57 消費分位以後隨分位提高，成長率也明顯地愈高，這一段的消費線相當地陡。筆者認為，正由於 1980-1995 年間，愈高的消費百分位家戶之消費成長率與中、低分位有不小差距，所以我們在背景圖才會看到這段期間消費不均度快速上升。

再看 1996-2007 年，所得成長率與消費成長率這兩條線的相對位置，與 1980-1995 年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圖 3-4，所得線多位於消費線之上，且所得成長率與消費成長率都在 5% 以上。在圖 3-5，消費線多位於所得線之上，且兩項成長率都小於 2%。就 1996-2007 年的所得線來看，第 1 分位的平均成長率有 0.65%，還比第 2-20 分位的平均成長率高，筆者認為這是台灣 1990 年代中期後，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移轉所得所產生的功效。第 25-80 分位的平均所得成長率都在 0.6% 上下，所以這個區段大致為水平線。但所得第 80 分位以上的成長有較明顯的上升趨勢，這是我們之所以在圖 3-1 觀察到 1990 年代中期以來台灣所得不均度持續上升的原因。這也呼應李瑞中 (2009) 對台灣 1997-2006 年間所得分配的觀察。相對地，這段期間之所以消費不均度遞減，是因為此時消費低分位家戶的消費成長率總是大於高分位的消費成長率，第 1-81 分位的消費成長率都大於 1.03%，第 82 分位以上的成長率都低於 1%。



■ 圖 3-4 台灣 1980-1995 年百分位所得與消費平均成長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



■ 圖 3-5 台灣 1996-2007 年百分位所得與消費平均成長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

陸、結論

本研究用台灣 1980-2007 年的家庭收支調查為實證資料，利用吉尼係數分解與計算百分位家戶所得與消費成長率，探討台灣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原因及意涵。吉尼係數分解的結果顯示，食品支出與保健支出，都有使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作用，但食品支出與保健支出的不均貢獻度呈現一消一漲的現象。食品支出平抑總消費不均度的力量之所以變小，是因為低所得家戶（多數也是低消費家戶）的小戶量化，意即從多口之家變成少口之家。

台灣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總消費不均度下降主要原因之一，是保健支出具平均化的作用且其對總消費不均度的貢獻度愈來愈大。保健支出份額上升，是保健支出對總消費不均度貢獻度變大的原因；而台灣人口老化與 1995 年實施的全民健保險制度，是促使家庭保健支出份額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國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第二個原因，是房租支出的角色轉變了。房租支出在 1980 年代初期有增加總消費不均度的作用，而在 1993 年以後反而是使總消費不均度縮小；這背後的原因是 1990 年代以來房價持續上升。

經由高低所得組的消費差異分析、及百分位所得成長線與消費成長線的對照，筆者認為台灣 1996 年以來總消費不均度下降的現象，並非好事。這段期間總消費不均度之所以下降，是因為絕大多數家戶的經濟狀況變差，尤其是低所得家戶的所得無成長，但保健與房租支出卻日益攀升。

依筆者從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庫的分析，1980 年所得最低 10% 家戶的可支配所得為 100,785 元，總消費是 97,286 元，亦即收支相抵仍有餘。但 1996 年最低 10% 家戶是總消費大於可支配所得，缺口是 31,272 元，2007 年的缺口擴大為 42,951 元。由於低所得家戶呈現常態的負儲蓄且有相當比例的成員已退出勞動市場，他們一方面面臨老化而保健支出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房租負擔也相當沈重。所以在政策思考方面，有必要透過公共政策來提供其更多身體照護與居住保障。

有關身體照護支出保障的政策，現有的全民健康保險屬於急性醫療保險，但很多老人同時面臨長期照護的需求，因此建構制度化的長期照護制度實在是刻不容緩。本研究顯示，1996 年最低 10% 所得組的保健支出中，有高達 71% 是健保就診費，2007 年也有 66% 的比率。誠然，低所得組有相當多的成員是老

人，而老人須就醫的機率高於年輕人，但老人就診費如此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國長期照護體系尚未完善，導致過度湧向急性醫療體系。若趕緊建構長照制度，也會有疏解健保的財務壓力之效。居住保障方面，政府應加速整合民間資源，釋出更多的社會性住宅，以減輕經濟弱勢的居住成本。

除政策面的思考外，由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也可與第二節的經濟假說作對話。正因為我國低所得群體的老人比重上升，且此群體陷入收支缺口擴大的窘境，所以筆者認為低所得群體面臨的是「恆常所得衝擊」，而非短暫所得衝擊。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一旦老人有長期照護需求，因老人身體的不具回復性特質，所以照護開支往往逐時增加，另外在房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房租支出對低所得者也是逐時增加的負擔。基於上列理由，在解釋所得分配與消費分配的恆常所得假說與完全市場假說間，筆者較認同恆常所得假說，也認為諸多資料已顯示經濟弱勢遭受的恆常所得衝擊力道正在加大，而弱勢者已無儲蓄來因應這些風險，政府幫助弱勢的照護與住宅政策推展腳步應加快才是。

■ 附表 1 台灣 1980 年、1996 年及 2007 年全體家庭的平均消費組成

單位：%

消費項目	1980	1996	2007
食品支出	38.4	25.7	23.5
飲料費	1.7	1.1	0.9
菸草費	2.7	1.0	1.0
衣著類	6.7	4.3	3.1
房租支出	18.4	23.5	22.3
燃料及燈光	5.1	3.2	3.3
家具及家庭設備	2.6	2.1	1.5
家事管理	1.6	1.8	1.6
保健支出	4.3	11.1	14.9
運輸與通訊支出	6.1	8.7	11.4
娛樂與教育支出	7.2	11.2	10.6
雜項消費	5.1	6.2	5.9
總計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參考文獻

中文

- 于宗先，2008，「M型社會的隱憂」，*經濟前瞻*，第119期，9月：頁91-95。
-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專業人士），2009，社會指標—人口統計表，<http://www.stat.gov.tw/lp.asp?ctNode=538&CtUnit=375&BaseDSD=7>。2009/04/08。
- 王永慈，1995，「我國直接稅的所得再分配效果—兼論等值量表的敏感性」，*臺灣大學社會學刊*，第24期：頁211-237。
- 王金利和于宗先，2009，*台灣人口變動與經濟發展*（台北：聯經出版社）。
- 王德睦、何華欽和呂朝賢，2003，「兒童與成人基本生活費用的差異」，*調查研究*，第13期：頁5-38。
- 朱敬一和鄭保志，2006，「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紀念費景漢院士」（專題演講文章），發表於紀念費景漢教授學術研討會—台灣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台北：財團法人費景漢先生紀念文教基金會、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主辦，6月30日）。
- 行政院主計處，2008a，*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2007*（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行政院主計處，2008b，*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行政院主計處，2010，*98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李瑞中，2009，*2020年的人口社會結構預測報告*，（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
- 洪明皇、陳昭榮和葉炫偵，2009，「台灣的新貧現象與消費不均度，1997-2007」，發表於台灣社會福利學會2009年年會（台北：台灣社會福利學會主辦，5月24日）。
- 洪明皇和鄭文輝，2009，「所得定義與均等值設定對經濟福利不均的測量影響」，*經濟研究*，第45卷第2期：頁11-63。
- 曹添旺，1996，「臺灣家庭所得不均度的分解與變化試析，1980~1993」，*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8卷第2期：頁181-219。
- 陳孟甫和林弘文，2007，「1994-2005 台灣家庭所得不均度的分解與變化分

- 析」，**台灣經濟論衡**，第 5 卷第 6 期：頁 1-22。
- 陳建良，2007，「1980 年至 2000 年台灣擁屋家戶儲蓄行為之變遷：分量迴歸分析的新發現」，**住宅學報**，第 16 卷第 1 期：頁 57-78。
- 彭素玲、郭迺鋒、周濟和方文秀，2009，「人口年齡結構、所得分配與產業結構轉型對臺灣民間消費與總體產出之影響」，**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39 卷第 2 期：頁 51-101。
- 鄭文輝，2007，「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演進」，發表於 2007 年海峽兩岸財稅學術研討會—建立繁榮、安定的福利社會研討會（中國瀋陽：中華財政學會，中國財政學會）。

英文

- Attanasio, Orazio, Gabriella Berloffa, Richard Blundell, and Ian Preston. 2002. "From Earnings Inequality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 *Economic Journal*, vol. 112, no. 418 (March), pp. 52~59.
- Barreti, Garry, Thomas Crossley, and Christopher Worswick. 2000. "Consum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ustralia," *Economic Record*, vol. 76, no. 233 (June), pp. 116~138.
- Blundell, Richard and Ian Preston. 1998.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Income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3, no. 2 (May), pp. 603~640.
- Blundell, Richard, Luigi Pistaferri, and Ian Preston. 2008.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Partial Insur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8, no. 5 (December), pp. 1887~1921.
- Brewer, Mike, Alissa Goodman, and Andrew Leicester. 2006. *Household Spending in Britain. What Can It Teach Us about Poverty?* (Bristol, UK: The Policy Press).
- Buhmann, Brigitte, Lee Rainwater, Guenther Schmaus, and Timothy M. Smeeding. 1988. "Equivalence Scales, Well-Be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 Sensitivity Estimates Across Ten Countries Using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LIS) Database,"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vol. 34, no. 2 (June), pp. 115~142.
- Casado, Jose Maria. 2011. "From Income to Consumption: Measuring Households

- Partial Insurance,” *Empirical Economics*, vol. 40, no. 2 (April), pp. 471~495.
- Crossley, Thomas F. and Krishna Pendakur. 2006.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Canada,” In David A. Green and Jonathan R. Kesselman eds., *Dimensions of Inequality in Canada* (Vancouver,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pp. 127~154.
- Cutler, David M. and Lawrence F. Katz. 1992. “Rising Inequality?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1980'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2 (May), pp. 546~551.
- Deaton, Angus and Salman Zaidi. 2002. “Guidelines for Constructing Consumption Aggregates for Welfare Analysis,”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Working Paper* no. 13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Fei, John C. H., Gustav Rains, and Shirley W. Y. Kuo. 1978. “Growth and the Family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Factor Compon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2, no. 1 (February), pp. 17~53.
- Fei, John C. H., Gustav Rains, and Shirley W. Y. Kuo. 1979. *Growth and Equity: The Taiwan Cas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a. “Impacts of Policies on Poverty: The Definition of Poverty,” http://www.fao.org/tc/easypol/output/search_by_topics.asp(accessed: September 3, 2007).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b. “Equivalence Scale: Subjective Methods,” http://www.fao.org/tc/easypol/output/search_by_topics.asp(accessed: September 3, 2007).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c. “Policy Impacts on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by Income Sources,” http://www.fao.org/tc/easypol/output/search_by_topics.asp(accessed: September 3, 2007).
- Friedman, Milton. 1957.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rner, Thesia I. 1993. “Consumer Expenditure and Inequal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 75, no. 1 (February), pp. 134~138.
- Gouveia, Miguel and Jose Tavares. 1995.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n Portugal: 1980 and 1990,"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vol. 41, no. 1 (March), pp. 1~17.
- Johnson, David and Stephanie Shipp. 1995. "Trends in Inequality Using Consumer Expenditures: 1960 to 1993," *Proceedings of the Section on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 Lerman, Robert I. and Shlomo Yitzhaki. 1985. "Income Inequality Effects by Income Source: a New Approach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7, no. 1 (February), pp. 151~156.
- Li, He. 2000.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Mexico,"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28, no. 2 (May), pp. 275~291.
- Lopez-Feldman, Alejandro. 2006. "Decomposing Inequality and Obtaining Marginal Effects," *The Stat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6, no. 1 (March), pp. 106~111.
- McGregor, Patrick and Vani Borooah. 1992. "Is Low Spending or Low Income a Better Indicator of Whether or Not a Household is Poor: Some Results from the 1985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ol. 21, no. 1 (January), pp. 53~69.
- Modigliani, Franco and Richard Brumberg. 1954.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In Kenneth Kurihara eds.,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lesnick, Daniel T. 1994. "Consumption, Needs and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3 (August), pp. 677~703.
- Sun, Way and T. H. Gingling. 2000.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aiwan: 1978-1995,"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vol. 12, no. 4 (Winter), pp. 597~629.
- Zaidi, M. Asghar and Klaas de Vos. 2001. "Trends in Consumption-based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during the 1980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 14, no. 2 (June), pp. 367~390.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Inequality in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information from the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 from 1980 to 2007 as empirical data. We decomposed the Gini coefficients and calculated the percentile distribution of the growth rates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o identify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in tot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since the mid-1990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presented below. First, medical and rent expenses had an equalizing effect on tot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Th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inequality share of medical and health expenses in Taiwan is related to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1995. Second, the decline in total consumption inequality since 1996 is not a positive phenomenon. Most households have experienced an economic decline since 1996. This lack of income growth has limited the growth of total consumption, leading to invariable household expenditure. Particularly, low-income households are spending a substantially greater portion of their income on medical and rent expenses although their income has had minimal growth.

Key word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economic well-beings; Taiwan

JEL classification: D12, D31, E21